



张贤亮谈创作

宁夏大学学报编辑部

张贤亮谈创作

宁夏大学学报编辑部

前 言

《张贤亮谈创作》汇编的主要是他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经验总结，他同孟伟哉、李国文、从维熙、冯骥才、何士光等全国著名小说家，彼此交流创作感受的心得体会，以及他接受文学青年、文科大学生的邀请，报刊杂志记者的采访，广泛谈论文学创作、文学思潮、文学批评，继承古代文学传统，借鉴外国艺术经验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为广大文学爱好者、习作者、评论家、研究家提供了认识理解文学和文学创作规律，评论研究作家和作品特点的宝贵材料。

张贤亮结合自己艰难、曲折的人生遭遇，谈他领悟到的历史真理；联系三中全会给他思想上带来的激励、生活创作上带来的鼓舞，谈其创作的冲动和激情、理想和追求，态度都是严肃认真、真挚诚恳的。他从切身的社会实践、创作实践出发，谈感受，谈体验，谈认识，既真实、亲切、生动、富有启发性；又能上升到理论，具有一定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光彩和深度。

他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基本上是一致的。早期小说创作题材、主题和格调上的特色，是与他特殊的生活命运息息相关的。因此，他深刻揭露极“左”路线，表现痛切的情思，歌颂劳动人民的人性美、人情美。他热忱地拥抱现实生活，“近距离”地反映社会改革，也都和他的创作理论、指导思想分不开。甚至，他创作上存在的某些缺点和不足，也大

都可以从他的理论见解上找出根源。

张贤亮不是为写创作谈而写创作谈。也不是单纯地为阐发某些文学理论问题而写创作谈。他往往是为了呼应时代和人民的要求，从一个革命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出发，从总结经验，以利奋进出发，或严肃认真、诚挚坦率的自我审视，剖析自己创作的成败得失，在生活、思想、创作上进行自我认识和教育，以便向更高的艺术境界攀登，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或是就社会上出现的文艺思潮、创作倾向、理论批评等发表自己的观点。因此，读他的创作谈，对文学爱好者、习作者和评论家，常常具有明显的启示意义。

由于水平所限，我们的汇编工作，可能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热切地盼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编者

创 作 自 述

严酷的生活遭遇给他的创作造成的巨大影响。他的现实主义美学追求。

从事专业创作三年后的回顾与总结。他呼唤伟大史诗作品,倡导深入生活,提高认识生活的能力。

对自己创作的自我审视和认识。

同文学青年和文科大学生谈小说创作问题。

目 录

创 作 自 述

满纸荒唐言·····	(1)
从库图佐夫的独眼和纳尔逊的断臂谈起·····	(9)
必须进入自由状态·····	(15)
深入生活与学习理论·····	(29)
应该有史诗般的作品出现·····	(31)
努力提高认识生活的能力·····	(33)
深入生活与认识生活·····	(37)
在北戴河笔会座谈会上的发言·····	(40)
牧马人的灵与肉·····	(45)
牧马人的画外音·····	(49)
《龙种》获1981年《当代》文学奖时的讲话·····	(51)
从《龙种》的拍摄谈我区开创文学艺术新局面·····	(52)
不可取的经验·····	(55)
《肖尔布拉克》与《河的子孙》·····	(58)
学到的和感受到的·····	(61)
关于《绿化树》的一些说明·····	(63)
关于《绿化树》·····	(67)
张贤亮谈创作·····	(70)
秋凉夜话·····	(77)
张贤亮同宁夏大学学生谈文学创作·····	(85)

北欧三国行——在祝贺《肖尔布拉克》获奖座谈会

上的发言·····	(94)
老人二题·····	(126)

作 家 书 简

心灵和肉体的变化·····	(119)
“人是靠头脑，也就是靠思想站着的”·····	(126)
以简代稿谈《龙种》·····	(133)
写小说的辩证法·····	(137)
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改革者·····	(151)
关于时代与文学的思考·····	(161)
唯物论者的艺术自白·····	(169)
一九五七年给《延河》编辑部的信·····	(178)
《大风歌》后记·····	(182)

作 家 专 访

向生活深度开掘的人·····	(185)
他也是黄河的子孙·····	(195)
“曾经大海知深浅”·····	(206)
访著名中年作家张贤亮·····	(209)

主要生活创作年表

满纸荒唐言

最近，与朋友们聊天，末了，他们几乎都是异口同声地这样说：“你这些年是吃了不少苦，不过，话说回来，这倒给你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

对此，我只能报之以苦笑。“塞翁失马”，“因祸得福”，“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些话，用来安慰别人和自我安慰倒很得体，而当真要把对待“右派”的办法作为经验来培养作家，我可是要抱头鼠窜，逃之夭夭的。

单从一件事的结果来看，决然看不出进行那件事的全部过程。如果那个结果既没有玲珑剔透的结构，又没有绚丽夺目的光彩，不过是一块很不起眼的结晶体，那就更会把结晶的过程看得很容易了。我从七九年迄今，发表了八个短篇和一个中篇，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那里面凝聚有我痛苦的人生经验，但是，说实话，如把这一点痛苦的结果和漫长的痛苦的过程相比较的话，是太得不偿失了。

高尔基也有一段痛苦的经历，不过，从史料介绍和他的小说来看，他老人家是有意识地要去认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有意识地要去更深刻地体验人生的；同样，契诃夫冒风雪，踏泥泞，单身前往库页岛，一直深入流放者的流放地，也属于“自讨苦吃”之类。他们事先就把文学作为一种事业，而把“自讨苦吃”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可以想象，他们在自己的整个痛苦的经历中，会有意识地去捕捉“众生

相”，牢牢抓住每一个生动的、闪光的故事和细节，以备他们进行文学创作之用。而我们这一代中年作家，在踏上苦难的历程的同时，就把文学创作置诸脑后了。待痛苦的历程到了头，回顾过去，脑子里只剩下一股惋惜和惆怅而已。

一九五七年七月我在《延河》上发表了《大风歌》，当时正值反右高潮，我幸逢其盛，顺理成章地就成了右派。我们不要以为“文化大革命”中那种触及灵魂的大批判只是一九六六以后的新生事物，实际上在一九五七年不仅已见其端倪，而且还很肆虐了一番的。大批判、大字报、大辩论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不但会三人成虎，使市人瞠目咋舌，还会把当事人也搞得晕头转向，自以为不死不足以平民愤。当时我只有二十一岁，哪见过这般阵仗，还没有招架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举笔投降了。那时候要是评自我检查深刻奖，我是定会被评为一等第一名的。不过，话说回来，也正因为检查得深刻（深刻者，无中生有，以小为大，即后来的“无限上纲”之谓也），所以我才没有自杀以谢罪，反而苟且以偷生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把自杀定罪为“自绝于人民”的专案人员，倒真有几分犯罪心理学家的天才，我见过几个自杀的人，究其原因的确全是出于思想抵触，委屈抱怨，对加于自己的罪名百思不得其解，终于悬梁跳井的；相反，认罪知错的人，却会乐天知命，任杀任剐，任打任罚，从而也就玩世不恭地活下来了。

.....

劳动就劳动吧，反正我年轻力壮，又生就一个不好动脑筋的懒脾气。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六年十八年中，我两次劳教，一次管制，一次群专，一次关监（别以为我以后又犯

了什么了不得的大罪，接二连三的惩罚全是第一次罪名衍生出来的），但在铁丝网里却练得一块好身胚。体重达一百六十五斤，能背八袋子白面上三层楼高的跳板，能扛两麻包小麦绕谷场三圈半，多次在即兴打赌中获胜，赢过上百包纸烟；在农活上，耕耙犁锄，提耩下种，割捆装运，田间管理，赶碾扬场……，我无所不能。我受到农场领导的赏识，仅此一端就可以说明：在极左路线最猖獗的时期，我身为“右派分子”，可粮食不够吃，农场破格一次就给我补助了一百五十斤。当然，那些粮是只能在“饲料”的项目下支出的。

当一个人完全认为自己有罪，除了劳动权之外被剥夺了一切社会权利，甚至被剥夺了爱与被爱的权利以后，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只有一种动物的求生本能罢了。十几年间，我生活在一个山坡下的小小的生产连队，几乎与人类文明绝缘，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两个饱一个倒。抽象的思维活动完全停止，日常行动仅仅靠生存的欲望和传统的行为规范的惰性来支配。于是，我体内的那种正常的文明人的素质就被压抑、被扭曲了。我躯体健康，但大脑却有了病变，开始出现精神上的返祖现象。人性不是抽象的，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当时我所处的社会关系，也许会造成别的什么种种人，但决不会造就出一个作家。

啊，但愿那样的社会关系永远绝迹吧！不要再使作家经历那样的浩劫，不要再用那种方式来培养作家吧！

然而，我毕竟还是个人，毕竟还有七情六欲的残余。孤独的心总要有所依傍才有勇气继续跳动；即使是野兽，也希望得到同伴的爱抚。而孤独悲凉的心，对那一闪即逝的温

情，对那若即若离的同情，对那似晦似明的怜悯，感受却特别敏锐。长期在底层生活，给我印象是深刻的，就是种种来自劳动人民的温情、同情和怜悯，以及劳动者粗犷的原始的内心美。这就是我因祸所得之福。这点，唐挚同志在《小说选刊》的评论中发现了。但我觉得，我拙劣的文笔还没有表现出劳动人民内心美的万分之一。漂母一饭，韩信终生不忘；我在困苦中得到平凡微贱的劳动者的关怀，一点一滴积累起来，即使我结草衔环也难以回报。所以，在我又有机会拿起笔来的时候，我就暗暗下定决心，我今后笔下所有的东西都是献给他们的。

不过，虽然我经常领受到这种同情和关怀，但心灵的深处总有一个孤独感的内核。这倒不由于自己不认罪知错或是抱有怀才不遇的非分之想，更不是屈子披发泽畔，吟哦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时那种孤独感，而是因为年过三十五尚孑然一身。独坐斗室，形影相吊，看到别的农工虽然贫困但还算得温馨的家庭生活，一股悲凉之情总会不可遏制地油然而生。可是，社会身份和经济条件都不许我感关雎而念好逑，于是我只得做各种各样罗曼蒂克的梦。阎纲同志在对我的小说的评论中指出，我笔下多次出现的逃荒流浪，处于底层的劳动妇女，是最近短篇小说中“不可多得的动人形象”。是的，因为那都是我，也只能是属于我的梦中的洛神。《吉普赛人》中的“卡门”。《在这样的春天里》中的“她”，《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中的女乞丐，《灵与肉》中的秀芝，《土牢情话》中的女看守，这些艺术形象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具体的模特儿，但她们的灵魂，的确凝聚了我观察过的百十位老老少少劳动妇女身上散发出来的圣洁的

光辉。现在，承一些评论和读者来信过奖，说这些形象都是真实感人的。我觉得我并没有欺骗读者，赚取了一掬同情的热泪，因为在她们的塑像中就拌和有我的泪水。在荒村鸡鸣，我燃亮孤灯披衣而起时，我甚至能听到她们在我土坯房中走动的脚步，闻到她们衣衫上散发出的汗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一个个都是实有其人。

那末，是什么力量把我的灵魂从迷蒙混沌中挽救出来的呢？我长期与文化艺术隔绝，又怎么能一平反就可以动笔写作呢？实际上，这中间有个准备期。

一九七六年接踵而来的三件大事——“天安门事件”，毛主席逝世，打倒“四人帮”，使我在震惊的同时朦胧地预感到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史要翻到一个新的篇章，随之，我个人的生活恐怕也会有新的变化。于是，我从动物的冬眠状态苏醒过来，以空前的勤奋，利用早晨、中午、夜晚和假日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要经典著作；三大卷《资本论》我反复读了好几遍。从七六年初到七六年底，我写下了二十多万字的读书笔记，整理出了几万字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论文。我的身体急剧地垮了下去，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终于廓清了弥漫在我眼前十几年的大雾。党的三中全会精神，三中全会以后直至今天的种种改革，连同我们在改革过程中的阻力，我在七七年底已预测到了个大概。同时，我在思想上已经断定：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我曾用戏谑的口吻对朋友说：“老夫要出山了！”

但是，我在农场，早已被人看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劳动力，并且当时极左思想还相当严重，在党中央关于纠正冤、假、错案的文件下达很久以后，还没人准备动动我的案子。

我不得不毛遂自荐，四处奔走，顶礼于权门，求告于当政。好不容易博得领导的青眼，调我去教了一个月书，又说我的问题没有平反，打回了连队。此后，我的处境反而更困难了，问题因为上而复下，等于第二次惩罚。扣资罚款，名目有加，冷嘲热讽，时聒于耳，再加上我一次短暂的家庭生活的失意，投寄的政治经济学论文被相继退回，这样，我的苦恼更甚于作动物的冬眠时期，因为，那已经是成为人的苦恼了。

后来，农场因为实在缺乏教员，又把我调到学校，可是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一天，一个好朋友劝我：中国哪有什么政治经济学，不过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而已，你何不写写文学作品，引起人注意，好让你们农场尽快解决你的问题呢？一语道破天机。我顿时茅塞大开，及时改弦更张，一晚上写了一篇四千字的小说——《四封信》，投寄给《朔方》。感谢《朔方》的编辑同志，很快就以头条位置把这篇小说发表了。《朔方》，在我再次走上文学的道路上起了关键作用。而我之所以开始写小说，套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却决不是内心激动的结果，还恰恰相反。所以，在北京，唐因与唐挚同志对我说，你可以在“你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栏目下写点文章时，我坦率地回答，我第二次走上文学的道路的动机，恐怕是上不得台面的。

我开始正正经经把文学当作自己事业，是在发表了《四十三次快车》以后。那时，宁夏党委和宣传部、文联的领导同志多次在会议上提出要给我落实政策，《大风歌》的改正旁证也从西安寄到了。我本是驽骀，而宁夏主持文教宣传的领导人的确具有伯乐精神。这样，我就面临着我生命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关头，必须要严肃地思考自己的命运了。所谓

严肃，当然就是把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考虑。于是，我极其自然地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党的三中全会制订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用“四人帮”时风行的语言来说，就是我的生命线！所以，从《霜重色愈浓》以后的各篇，都是紧紧地围绕着三中全会这个重大主题展开的。我感谢沐阳同志在《文艺报》上为我总结出这样的话：我的作品，即使是“伤痕文学”也罢，总是要告诉人们：“那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再不要重复了，那些摧残心灵的悲剧再不要重演了，让劳动者之间的友谊、同情、爱恋，滋润着、温热着每一颗善良正直的心吧。”

因而，在文艺界讨论作品的社会效果时，我总认为，一些好心人可完全不必担心我们这些逢春的枯木会“离经叛道”，搞出什么有损于社会主义的作品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身受过极左路线迫害的中年作家，大概比某些好心人对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有更清晰的历史感，对阻碍“四化”建设的这样和那样的阻力有更强烈的义愤。我们决不会偏离党的三中全会的路线。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下，党的“双百”方针才能贯彻执行，才有文学事业的真正繁荣。

最后，我还想谈点似乎也和创作有关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不是太看重了作家作为一个公民的社会性方面，而忽略了作家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生物性方面。思想认识的过程有在一朝一夕中完成突变的，几十年固守的政治偏见有在经过一次重大事件而彻底放弃的，但是，一个人在某一个特定的生活条件里形成的某种精神气质，还没有在一个新的条件下很快就能变化的先例。一个人在青年时期的一小段对他有强

烈影响的经历，他神经上受到的某种巨大的震撼，甚至能决定他今后一生中的心理状态，使他成为某一种特定精神类型的人。这和那个人所抱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点无关。如果这个人恰恰是个作家，那末不管他选择什么题材，他的表现方式、艺术风格、感情基调、语言色彩则会受他这种特定的精神气质所支配，而不由他的政治观点来决定。现在所谓的伤痕文学，大多数是积极的，有助于激励人民去排除“四化”过程中的阻力，坚定群众建设美好的未来的决心；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其中有许多作品，在风格、基调、色彩上是不够高亢明快的。这在一直身在福中，没有伤痕的人来看，当然会以为作家是在无病呻吟。然而，风格、基调、色彩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作家本身精神伤痕的表现。遗憾的是，有精神伤痕的作家在我们这里的确是太多了。那末怎么办呢？我在这里想高喊一句：

再给我们一段愈合的时间吧！到时我们会唱出夜莺般的歌。

《飞天》1981.3.

从库图佐夫的独眼 和纳尔逊的断臂谈起

——《灵与肉》之外的话

小时候，翻着世界名将肖像画册，我觉得独眼的库图佐夫和一只胳膊的纳尔逊，比恺撒和安东尼更有震慑人心的力量。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何许人也，属于什么阶级成份，而画面上给人的却是一种雄健的、严峻的、深沉的美感。这种美感，和欣赏《蒙娜丽莎》与《雷卡米埃夫人》时获得的美感在质上有微妙的区别，而程度上却是同样的。独眼和断臂这样的伤痕，非但没有损害他们的形象，反而给他们增添了特别吸引人的丰采，使人不由得联想到他们的痛苦和他们的斗争，敬仰之情油然而生。这里，缺陷构成了美。

在长达十年，甚至二十余年的“左”的路线统治下，人们肉体上和心灵上留下了这样或那样的伤痕，这是无可讳言的。现在有许多文艺作品写的就是这些。但是，怎样有意识地把这种种伤痕中能使人振奋，使人前进的那一面表现出来，不仅引起人哲理性的思考，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还并不为相当多的作者所重视。《灵与肉》不过想在这方面做个尝试而已。

然而，痛苦中的欢乐，伤痕上的美，绝不是能编造出来的。在这种题材上强加笑料或涂抹华丽的色彩，只会令人啼

笑皆非，莫知所云。这里，美和欢乐，必须来自伤痕和痛苦本身，来自对于这种生活的深刻的体验。我在二十一岁时因发表《大风歌》被错划为右派后，明关暗监二十年，真是“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陈与义《临江仙》）；但劳动人民给我的抚慰，祖国自然山川给我的熏陶，体力劳动给我的锻炼，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给我的启示（这绝不是虚言，那时只能看到这些书），始终象暗洞中的石钟乳上滴下的水珠，一滴、一滴地滋润着我的心田。我，正是凭着这些才幸存下来的。

当然，伤痕能表现出一种缺陷美，也只有在伤愈之后的眼球尚吊在眼眶外面的库图佐夫和还捧着血淋淋的胳膊的纳尔逊，尽管画面上是一片红海洋，也只会使人恐怖战栗。三中全会之后，痛定思痛，我们是可以从那些惨痛的经历中提炼出美的元素的；三中全会后的路线，是画面上的伤痕能表现出美的光辉的底色。

以上是我构思《灵与肉》时的基调。

《灵与肉》并不是出于当前有些人想出国，以致人才外流这种背景的考虑写的。宁夏地处边陲，弹丸之地，我又陋见寡闻，这种情况在我心目中还不占多大份量。写《灵与肉》，一，我是为了反我一直深恶痛绝的“血统论”；二，我想表现体力劳动和与体力劳动者的接触对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小知识分子的影响，以及三十年历史变迁对人与人的关系的新调整。

五七年批判我时，我的一位好友（现在仍是我的好友）在《延河》上发了一篇《张贤亮是什么人》，大部分篇幅却是我祖父和父亲的历史，真如曹操说陈琳的话：“荼及先